

万历十五年

The book by 黄仁宇

读书笔记

Copyright by Zhichao Zhou

序言

1. 黄仁宇的人生

少年

作者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郊区的福临镇，黄父曾经参加过同盟会，但据介绍并不是核心人员。父辈人的经历想来对黄仁宇的人生之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父亲在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后面黄仁宇也在抗战时期投笔从戎，决意抛弃大学时报考的理工专业，投身于时代的洪流当中。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如他所说的，“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少年时代的黄仁宇也一直有着很浓厚的文学爱好，从15岁开始，便向当地的报纸投稿，从此便一直写下去，一生没有间断。与他的“拿破仑梦”相辉映的，便是他从少年时代就一直燃起的心火——成为“大人物”。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刊载他所撰写的世界名人传记，并且每篇都有他自己手绘的人物画像。

在湖南的乡间，一个被长辈们那些关于大人物的传奇故事所灌养长大的小孩，心中燃起的当然会是这样的“星星之火”。而这样的志向，同样地，在他那一辈，上一辈，上上一辈的大人物，小人物之间，相互地传习、感染，变成了湖南人的一种标签，一种精神。暂且不论这些愿望是否都得成所望，达成后的归宿是否平坦，这些愿望、志向都养成了湖南这一片地方的精神沃土，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催生出一个又一个喧嚣历史的人物。

乱世出英豪，乱世当习武，应该是那个变革时代容易看到的，乡间人心倾向的，向上阶梯。

从军生涯

“由于抗战爆发，黄仁宇决定辍学，加入国军。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1940年），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后（1947年）曾任国防部参谋。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

从20岁大学辍学以后（1938年）到32岁（1950年）以少校（等同副营长）军阶从中国驻日代表团的队伍里面退伍，12年的军旅生涯并没有让黄仁宇的军政梦看到未来。他在抗战爆发的初期入伍，在国军败退的时刻退伍。这是中国战争最频仍的12年，作为一个下级军官，他曾经出生入死在战斗第一线，后来也因为其文字所长而分配到文职序列。谈不上失败，更罔论成功。这其中的日常、操演、实战、文牍应该没有太多的新奇故事，而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人，他必定在日日夜夜的空闲里，一遍又一遍，思考、分析、揣摩着，不断地校正、修改他的志向。

1946年（28岁）入美国陆军大学进修是一个契机，他应该发现，在大历史中，作为一个不成功的浪花，可能好的归宿还是彼岸的世界。至少，生活会过得好。毕竟，这一方的败局已定，而人不应该被栓死在一个地方。作为一个一贯的文学爱好者，他选择了赴美再读书，重新捡起古代文人，乡间人心，内心抱负都能接受的另一个枝桠。从文这条路，对他来讲，不仅仅是解决衣食之忧的。

就这样，在不太成功的军旅生涯之后，他又选择了一个“文”的道路，“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不用怀疑的是，这12年在历史巨浪尖头实际地沉沉浮浮过的经历，为他的思想奠定了总的基础，成了“大历史观”的流觞。

美国学习从教

////

战后负笈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教授。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1980年）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

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以致一时“黄书走红”，有人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

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

黄仁宇在密歇根大学读书时，著名的海外史学家余英时是他的导师。当时，黄的年龄比余还大，而他们以后也一直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在密西根大学读书的这段时间，黄仁宇顶着生活、年龄、学业上的压力，异常勤奋地专注中国史，形成了他独特的史观，成为了史学丛林里面独特而又举足轻重的“一家之言”。

但是这样的“一家之言”在当时并没有被重视，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因为他多年没有新著发出，便在他62岁的时候解聘出去。由于早期身份和经历带来的种种难题可能不仅现于这些，足见，当时黄仁宇生活和治学的艰辛。

也许是上帝钟情于这样的传奇故事，或者是借力于读者大众心内洪波的助推，不管基于何种神秘和世俗的解释，终于在退休之后，他迎来了潮平岸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广受好评，而他的“大历史观”、“技术史观”广为传播。其独特解析微观历史，分析历史心理的写作风格，更为广大历史爱好者们所推崇和欣赏，他的旧书、新书，一本一本被挖掘，流传，像甜瓜蜜炼一样，从一双手转到另一双手，从一张嘴传给另一张嘴。近期以来，影视剧热情高涨，“大明王朝”，“人民的名义”，这样的大剧，更加加速了他文名传播的广度。

因为没有像其他的历史学家一样，在进入研究大幕之前在书堆证丛之中拼杀博弈过一番，有的评论人，总是会提起他的历史训练背景。诚然，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里面也提到过，这本书并没有按照历史论著的严谨风格来处理，甚至出版社当时也对这本怪异的，似史非史、似说非说的著作不信任、不感兴趣。不过，幸好耶鲁大学出版社“走低”“滥发”而“盲目追求出版数量”，不然这本好书，便就此埋没了。由此微观可见大著，历史的选择总是难以琢磨的，人的遭遇，因缘际会，难于预测，像大海上的浮筏一样，时上时下，随波涛浮沉。

同样，正是因为黄仁宇这样的经历，从史之前的人生历练，使得他的史观带有浓重的生活体验。在密支那的树林里，在东京审判会场的间隙里，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的绿茵地上，他亲眼见过，听过，思考过。这样的思考宛不如在高墙长凳之下研墨临帖来得更深沉，细腻吗？

这样的历史观，来自生活，来自体验，来自思考，穿越时间空间，直击人心，掀起的巨涛，想来也是自然。

黄仁宇1966年在美国与盖尔·贝茨（Gayle Bates）结婚，并育有一子黄培乐（Jefferson Huang）。作为一个在美国旅居一生的学者，想来，在50年前从日本赴美之时想要有的世俗生活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至于著作广为大众所知、所传、所感，应该是他所意料外的。从一个湖南乡间少年的初心来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从一个从历史深处直到现代，传延千古仁人志士的初心来看，“立德”“立言”之梦也终于得偿所愿。

历史观点

在万历十五年一文的自序当中，黄仁宇写道，万历十五年一书的缘起来自于自己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更加深入地进入到明代的税收和财政，并且系统地阅读了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明代皇帝的言行记录）。

从这些材料的阅读思考当中作者形成了自己独立观点，不同于以往对于明代社会矛盾“税重民穷”的观点。反而，研究发现，明代的赋税不重，社会的矛盾集中于法律腐败和政府低能。税率低，而大小地主却肆加剥削底层农民，官僚也不断地加征人民赋税徭役。这样以来，阶层的差距悬殊愈加剧烈，而官僚系统的不作为或者难做为使得状况不能缓解和改善，以至于最后大厦崩塌。

在明代，江南富庶地方和沿海通商地方开始有了手工业、雇佣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然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却适应不了这样的改变，反而，以农耕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受到自上而下的儒家理学思想和行政强力的贯彻、巩固。同时，作为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肆意扩张的私人资本团体，私人资本文化势力影响甚至控制王朝的政治。

同时黄仁宇主张从技术角度看历史问题，想来，这应该是黄仁宇的文章最吸引人的要点了吧。中国历史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臧否人物，评论是非，总是以身前事，身后名，功过道德来评点。然而，事与愿违、无心之过、未竟之功等等这样的事件太多，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制度的执行者，作为一个大背景下的历史参与者，简单的历史功过，难以反应出真貌，对人物不公平，也不能从中睥见历史运行的规律和背后隐藏的必然。

这样以来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便有了真正的内涵。而大历史观的定义也有了明确的指向，那就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总体面貌上面来分析和把握，从历史社会的结构、背景、局限、走向和发展上看待历史问题，解析历史人物。

我想，形象一点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历史观就是，人是制度和社会需要下的人，在某一个历史的舞台上面的关键角色恰巧为一个人所扮演，从而坐上了历史上早就为其准备的角色席位。简单的道德评判往往脸谱化人物，而不能让人知晓其中的必然。历史人物也无法跳脱出种种技术上的限制，比如地理、科技、社会、背景等等，其高大卑微，贤与不贤，肖与不肖，不能简单地评价，而需要知道背后潜藏的历史社会脉络。

这样宏观的大历史观，加上作者基于历史事实的人物心理分析，娴熟的情节编排，流畅的文字描写，使得这本书兼有史学家的卓越观点和小说家的生花妙笔，让人爱不释手，一读上瘾。

历史上本来无关紧要的万历十五年，在作者的生动分析之下，变得举足轻重。在这一年里面发生的种种事件，既是之前发生事件的传递延续和惯性前行，也是潜伏败局的隐火小苗，在历史的长河里面，预示着未来。。。

1. 期望和实际 - 第一章 万历皇帝

角色扮演者

从传统的角度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号令臣工百姓，莫敢不从。但是实际上，每一代皇权、政治架构不同，皇帝的权威也不同，政治运行的方式也不同。在明代，从早期开始，宰相就被认为是皇权的威胁，而不再设相。到了中期，只为皇帝做行政秘书，而没有实权，也没有品级的内阁学士们一跃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皇帝的想法和命令必须通过他们的运作才能实行。

但是皇帝也要受到政治传统和百官臣僚的制约，他是角色扮演中的一员，虽然可以号令天下，但是真正能够做的却很有限。比如，皇帝也必须恪守孝道，所以母亲的教训对他来说至高无上，不听就是不孝。皇帝要早朝，服衣冠，主持典礼，遵守道德的约束，采纳官员对自己的批评，这样才能是一个好皇帝。

在这样的重压之下，皇帝的人生其实也是不得为已的。太后和张居正对万历的管教太严苛，万历也不得不遵守。礼教对皇帝的束缚也是一样，皇帝自己随便玩一下，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自己是义正辞严的，同样的，被批评者也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不得不说，这种制度和角色的扮演者确实很累。更有甚者，天上的客星出现，也被认为是上天对人间统治者的警告。在客星坠落的两年时间内，皇帝要节俭，勤勉处理政务，时时检视自己，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化解凶情，转危为安。

皇帝富有四海，但是知心人却没有几个。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哪怕是他的母亲。在母亲眼里，他的任务就是做一个好皇帝，机械得好像忽略了母子之情。

唯一可以安慰的就是婚姻里面的男女之情了。皇帝有三宫六院，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他的态度却是百依百顺、恭谦、警惕，保持着距离感。只有郑贵妃和他没有距离，敢于挑逗嘲讽他，又善于倾听他内心的烦恼，可能皇帝也只有这一个知心知情的人。在各种禁忌的压迫之下，郑贵妃是万历唯一的慰藉。

现实和理想

在少年时代，万历被各种教导，要做一个好皇帝。种种的安排和磨难都是为他当一个好皇帝做好准备。学书法，已经惊人的好了，还是不怎么被表扬，却被更加教导说要学历史和经学，这才是正道。张居正和李太后都太严格，但也是好心教导皇帝成为一个真正有品行有作为的好皇帝。

万历小的时候，批阅奏章都是张居正草拟，冯保口授，他则临帖画押。他自己的性格在这时也是给人一种软弱的感觉。看戏的时候万历觉得自己和戏里面的皇帝一样，政由“张”氏，而自己像一个礼仪典礼的傀儡。

作为一个皇帝，有这样不甘平庸的志向，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所受到的严格教育的一种反映。万历想成为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在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不可能。等到张居正死后，他就要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励精图治，开始做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皇帝了。

张居正在万历十五年之前的改革太激烈，在朝廷人事安排方面得罪了太多人，留下了刚愎自用，排除异己的恶名。当时朝廷分为两派，一派是拥张派，大部分为张所提拔的人，一派是反张派，攻击张是巨奸大猾，更有甚者，认为张是妄图颠覆的权臣。李太后父亲因为贪污被罚的旧怨也站起来反张。万历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刚开始的时候是出于他长期以来受张威慑和压制的逆反心理，随后却被朝廷的有心人士利用，添油加醋。万历听信了反对者，认为张居正对皇帝严格，而自己却口是心非，生活奢侈，卖官鬻爵，任人唯私，把持朝政。

万历亲政想乾纲独断，报复和老师的私人恩怨，不能说是大恶。但随后却被推波助澜，万历自己也身在其中，在不知不觉当中，形势变得更加凶猛，现实变得和他的初衷南辕北辙。

自我保护和过度反应

万历即位初期之时，高拱的一句无心之失被冯保和张居正利用，“一个十岁的皇帝”怎么能治理好天下？高拱最终被罢了官，这样的结果，对于高拱来说不甚公平。但是也可以理解，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当时是孤儿寡母，刚刚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内心的不安全感当然很甚。小小的一个风波就可以让万历母子高度警惕而做出过度反应。

冯保和高拱有嫌隙，高拱举荐了另外一个冯保看不上的御膳房主管当上司礼监太监，排挤了冯保。冯保使用上了自己的手段，骗得李太后和万历的过度反应而废黜高拱。同时，冯保也和张居正形成了内外朝的默契，他们联手，最高的权利始终都把持在冯保、张居正和李太后所形成的铁三角当中，而万历皇帝也在他们的保护之下，皇位牢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张居正能帮助年幼的万历很好地掌握朝政，推行改革，治理天下。

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也非常感于小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利用这一层非常有利的牢固关系，来施行改革的政治主张。而改革就必然要触痛各种政治利益，得罪人是必然的。比如，丈量全国的土地，要准确地丈量非常地不易，要防备豪强大族们的偷奸取巧，欺压穷苦，必须要用自己信的过的人，罢黜反对自己的人，这样就得罪人了。再比如，朝廷里面总有人会反对你，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或者干脆就是不喜欢你的专权，哪怕这样的专权是正确的，目的是好的。而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张居正很坚决，手段相当激烈，杖责发配那些反对者，让他们不可能再出现在朝堂之上。

这样强硬坚决的做法是张居正的性格使然，也是他对和皇帝与太后的关系自信使然。张居正夺情的时候，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然而皇帝给予张居正绝对的信任和支持。面对想要参倒张居正的奏章，皇帝下了旨意，说那些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而掩盖了大逆不道的目的——欺负我年幼，想要赶走我身边的元辅老臣，让我孤立无援而暗藏祸心。

在张居正回乡葬父的时候，万历和张居正秉烛夜谈，张居正说他被攻击是因为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顾其他，以至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万历也表示他非常明白，张先生的忠诚可以算得上是义薄云天。

同时，张居正的这种道德正义感也让他义正辞严地惩罚太后父亲贪污，规劝太后不要修庙信佛，虽然张居正很委婉地说明了问题，太后也识大体，但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背后有可以被挑动的可能。

信任破裂和无可奈何

反张风波刚开始的时候，万历对张居正还有非常复杂的情感，虽然他认为张居正是独揽朝政，蔽主殃民，但是张居正毕竟是万历的老师，他有辅政的功劳，人也已经过世了。万历也认为应该给他一个始终。

但是有两个信息的来源蒙蔽了万历的双眼，让他的态度直转急下，第一个就是郑贵妃影响，郑贵妃不甚安分，他认为万历太软弱了，应该拿出来皇帝该有的样子，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另外一个就是李太后家族势力的反应，李太后父亲因为贪污而被张居正责备，从此就对他百般看不惯。

大变心的导火索是高拱的病榻遗言，这个谣言使得太后和万历的防备心猛然升起，变得反应过度了起来。遗言第一就是攻击冯保，冯保在万历继位的初年就野心不小，站在万历的宝座边上接受百官的朝贺，分明是有不可告人的祸心。遗言第二就是，那个突然伪装进宫，想要行刺皇帝的王大臣其实是张居正举荐的戚继光的手下，当初他们想嫁祸高拱而没有成功，现在高拱反而抖出来，说是张居正一党谋求不轨的证据。这样一下子就触动了万历和太后的心理防线，往反方向去想了，同时也接受了外界更多的关于张居正有不臣之心，想要行伊霍之事的谣言。谣言一多，假的也就变成真的了。

万历就在自己的过度反应之下，对张居正家族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当万历很高兴地除掉了潜在的“反贼”，实现了自己强硬表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仍然受到百官和制度的约束，不能做任何事，同时也要受到百官在道德上的约束，不能过度地宠爱自己的郑贵妃，不能自由任性地做这做那。可能，他也在暗自后悔，自己的能力比张居正的十分之一都不如，要是张先生仍然能帮我治国那该有多好啊。

微观视角

在黄仁宇的宏观视角下，注定了张居正和万历改革的实践不能成功。但是，张居正其实可以避免自己在万历朝身死名灭罚没抄家的个人悲剧，只要他不趟这个浑水中，他就能自保。但是这个张居正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张居正了，而可能是得势的高拱，或者另外一位拥有皇家信任的权臣和强烈道德感的强力执行者。在封建道德的历史熏陶之下，不乏这样的以道德自诩，以天下重任为怀，刚毅果敢的能兵干将。

按照大的历史观，这样的改革是不能成功的。但是个人的命运却能在自己的掌控下，合理地规避或者绕开这样一条深沟。只要张居正不那么精明强干，不那么个性鲜明，在人事上朦朦胧胧，在为人举政上不那么咄咄逼人，就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走向。

而万历皇帝，他一直在张居正的教导下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而现在，却有了一个昏君的名声，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这还不稀奇，在后面，还有一个庸君的名声在等着他。这真是师徒两人的悲剧。

评万历，打油诗：

岂曰初无明君志？

自小磨砺志踌躇

练达人事慈母情

帝说图鉴名师训

柔性偏得凌风雷

骄悍塌边困心慰

出师不捷怀向者

元辅风骨励有为

木偶遭逢礼仪殿

枷锁束缚道德坛

从此汗青留庸名

哪晓大幕缠命悲

四十八年御皇极

深宫藏与欢与悲

后世评论深难知

人事一秋尽灰飞

2. 文官政治和调停 -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礼仪和道德

申时行曾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是张的一党。申时行在张居正内阁首辅主政时期事事秉承张居正的旨意，深得张居正之心，张居正以为得人。之前，张居正在百官空前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回乡葬父，临别的时候，向内阁举荐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申时行。申时行的个性并不像张居正那样精明强干，一心想要匡扶国家，改革制度；他在制度之内闪转腾挪，极力地维护大局的平衡和稳定。但是负面的评价也很多，看不惯看不起他的言官们，说他是“首鼠两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在历史的人物性格色彩的光谱里面，他应该是较淡的那一笔，软弱，无所作为，毫无存在感。但是事实可能不是这样。

申时行在张居正和张四维之后担任首辅。同时他也担负着教导皇帝读书和主持经筵的责任。经筵的负责人一半都来自朝廷所推举的德高望重的大臣，申时行尽心尽责地主持典礼，虽然繁文缛节，但是这是一种道德宣教的象征。

早期万历还能坚持这种苦役，后面逐渐倦怠下来。年轻的万历在座师们的教导下，以一个孩童的心态，规规矩矩地接受各种教条和规范，认为这是成为一个明君的必要功课。而后来，他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被驳，他想为母亲尽孝修房被驳，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被发现各种被训被教导。他受到像笼中之鸟一样的束缚，他想跑马，他想出去玩，但是都被规劝。大臣们拿着道德教条，不停地对他的所做所为做出规劝，在大臣看来是出自臣子们的责任和真心，但是在他，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压力。时间一长，万历变得习得性无助，对于这种象征性的礼仪，在他看来，是无比虚伪的，像是牢笼，想要找各种理由推脱和逃避。

申时行其实也对这样的繁文缛节感到非常地倦怠，他的年纪也不小了，在三九寒冬也还要坚持不停地举行这样的仪式，真的在体力上吃不消。同时，臣工们不可避免地也会有同样的想法，时时抱怨，但是他也无可奈何，这种让人身心俱疲的事情，必须要做。开经筵是必要的，学习经典，规范礼仪在于统一人心，同时也是明君作为的象征，臣工百姓们信心的寄托。封建王朝统治国家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法律的约束，更来自于文官和皇帝的同心一致。法律仅仅是底线，在古代中国，人们在社会公序良俗的教导下生活。全社会在道德礼仪的规范之下，在经典教条的指引之下，最大限度地达成一致，共同推行治理。

面对万历的倦怠，申时行作为一个世故的政治家，一边敏锐地知道皇帝虽然推脱，但还是仔细地找寻各种理由，这就好办。另一方面，和大臣这边协调，通融经筵的时间。这样，问题就都可以和缓地解决。朝廷的信心虽然受到不小的影响，但好在安然无事。作为一个臣子，申时行能克服自己，尽到责任，协调两方，真算得上为难他了。

文官政治

申时行为人温和谦让，不像他的几任前任一样，一旦手握权柄，处处钳制他人。王世贞对他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岸”，内心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立易帜。他深受张居正的器重，是少数以才干，而不是以谄媚见用的官员。但是，在张居正之后，他并没有奉行张居正的改革，同时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也并不扩大，让朝政得以稳定。

他的为人处事和执政理念不同于张居正。张居正推行的政策对错暂且不论，他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在文官系统里面产生出了巨大的人事风波，中上层的官僚们不认同他任用私人，下级官僚们认为他的政策难以执行，而在归结责任的时候处处不公正。申时行认为推行政策要依靠的还是这些文官，要在文官里面对政策达成基本的共识，同时也要凝聚人心，上下官员之间要协调一致。传统王朝的政治并没有那么的精细精准，常常文牍主义，即使精明强干像张居正一样，亲自查询数据，掌握实情，却也难以有千千万万个像张居正一样的官僚从上到下推行政策。申时行希望通过宣扬道德，聚拢人心来使上下官员协调一致，这样，他在人事上就一定要温和稳定。

各个部院的文官常常几个月看不到皇帝，皇帝也不按时参加经筵，这样以来，官员对皇帝的信心丧失了，怀疑皇帝已经失去了控制，被人所摆布，不辨善恶忠奸。官员之间相互怀疑，因团体而分派，在羸弱的道德框架下，各自盘算，这样以来不仅政策难以推行，连民变都难以控制。申时行出于这样的考虑，认为要折衷调和，要带头必须自己做到。在这样左右协调的过程当中，他也难以不被认为是不办事的大和事佬，为两边所批评。他看清了文官政治的特点，对这些不公正的批评，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应该接受，所以对外表现得温和谦让，对自己认为吃点苦，想开一点也没什么。他的个人特性和政治个性是一致的，他的处理方法所带来的政治局面和张居正截然不同。这样一种走向，不知道会怎样影响今后的政治，潜藏的问题能不能得以缓解和改善？

在明代，重文轻武，文官由科举选拔，读书当官不仅仅个人前途命运改变，而且是整个家族的荣耀。文官集团重视儒家经典，整个社会的风气也被影响。儒家的道德观是整个社会所推崇的行事准则，各个阶层都共同遵守。但是这是理想的情况，如果人人都能遵守那就没有社会问题，天下不用治理就会太平无事了。

问题就在于口头上的理想道德是阳面，背地里面的私欲是阴面，调和阴阳是政治家的大课题。整个官僚体制的风气决定了中央的政令是否能贯彻，基于好的出发点的政策，在层层转递之下，在基层实施能否得到好的结果。整个管理体制需要上下协调。中国的体制注重稳定，所有事情的处理都要以维持稳定为主，至于对微观事件的处理是否能真正的公正公平，也要受大局的影响，由此为出发点来考虑，在短时间小范围内难以绝对的公平公正。地方上的问题需要底下的人负起责任，而上峰目的在于维持大局，是否真正地公平处理，往往在于关系和信任。

一人一地难以独挡一面，为了自我安全感，团体派别形成，互相帮助，共同抵御风险。不可避免的，官僚系统里面的阳和阴需要非常小心地处理。申时行维护大局，而自己先诚心正意，带头提倡阳面，把纷争由大化小，不能不说他的政治智慧和个人操守都是无可挑剔的。

申时行的选择

皇帝和制度都受制于道德的约束，做法可以以现实作为基础处理，但是也要受到道德的审判。而这些道德审判里面所包涵的实际利益之争，如果不仔细的进入到现实场景之中不能很好地理解。而对那些在台面上人物的评价往往在自己阵营和敌对阵营中来回摇摆，所以，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不是极好就是极坏。

申时行的个性“蕴藉不立崖异”，一半出于本性，一半出于上级的前车之鉴。张居正推行新政力求改变庸怠的风气，提高官员办事的效率，通过重新统计田地，统一税法来增加国家的财富。但实际情况却让制度和习惯很难一时改变，小地主和自耕农刚刚摆脱贫穷，视低税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富裕的地方，大地主也会像自耕农一样拒不交粮，而法不责众，在一个县里面，因循守旧的习气使得办好朝廷的差事非常之难。同时官员也要从中收取回扣，这也是习惯。纵使县官清廉，积极办事，在豪强大户集体反对交粮，耍赖皮的情况下，也没办法。

张居正要想解决行政效率低的问题，必须专权独断，任用自己信得过的大小督抚推进自己的政策。同时，他也向自己的队伍许诺好处，这样才有改革的动力。但是，自古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由士绅阶层们依照常规来推行治理，用他们就必须给他们好处，容忍灰色的空间。贸然地强力推行高效率的管理政策，不仅推不动，还可能激化上下层之间交流沟通中的问题，加助反对的声音和浪潮。量的改变带来质的改变，如果影响到万历和太后对自己的信任，祸患就烧到己身了。好的是，在张居正生前，皇室的信任仍然稳固，他也可以通过权势和权术压制对手。但他死后，他所推行的新政在一片反对声中，竟然没有一项保留，而自己的家族和名誉也在这把火中烧尽了。

申时行为个人厉害计，也要吸取张居正的教训。在申时行之前的八个首辅，得善终的就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两个，这两个都以不争权，低调内敛著称。其余六人都倒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而皇帝对他们的处理则都是被其中一派所影响，要么废黜，要么处死，这六人的下场不能不说是遗憾。有的人因为政策的推行而结怨，有的人因为性格的强硬而引起仇视，一旦小错集多，小怨集大，引起皇帝主观颠覆性地改变，那么这些人就会被群臣道德审判，要么身死要么名裂。

高启愚的事件差点让申时行倒掉，攻击者们罗织他出的乡试题目是宣扬禅让，为张居正摇旗呐喊，这直接点出了皇帝心理上面的要害，异常狠毒。这不是目的，而目的是申时行，因为他是张党，张居正不在了，张党的人事布局不会马上就散，搞垮他，让三辅王锡爵上位，那么这一派就有上位的希望了。

好在万历皇帝了解这些争斗的根源，同时王锡爵也冷静，这件事情以双方阵营略微的损失告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有赖于申时行一贯为人忠厚，皇帝对其的信任，和王锡爵的态度。事件的处理整体上的氛围是息事宁人的，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王锡爵也是申时行的苏州老乡，所以这些来来去去的网络也证明同僚、同事、同年、同乡之间的私人友谊对于历史方向的影响。

双重性格和妥协政治

申时行认为文官有阳面也有阴面，阳面来源于诚心正意的道德理想，而阴面就是个人和团体的私欲。作为首辅，应该调和阴阳，鼓励阳而使阴的一面得到限制，这样的标准很难拿捏，处理不好就可能被认为是虚伪，首鼠两端，而跌下崇高的首辅地位。

同时文官也不仅仅是行政的工具，而士大夫有文名和道德之名，深孚众望的官员引导社会的舆论，执掌民间的评价，得罪了他们就没有好果子吃，嘲讽贬低之声就会纷至沓来。自古就有清流和浊流，清流好名，却也有阴面。而浊流们也目之为清高无能，嘈杂多言而不知做事之艰难，在道德高地引腔弄调当然简单，其实目的却不得而知，虚伪却以道德自诩。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做法来源于他们个性的不同，前者偏激失于宽厚，而后者更能约束自己，宽大他人。不管申时行出于现实自保还是高尚道德修养使然，他表现出了开阔的胸襟。

张居正利用言官钳制对手，他让敌对者怨恨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他仗着皇帝的信任也敢于这么做。他推行考成法以行政政绩严格地来评判官员升迁，但是各地的情况不太相同，收缴税款，逮捕盗贼难以达成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划为官员不力。

申时行一改政策，张居正最后的改革成果被消除。出于妥协的目的，京官的考核他也没有做大动静，这样的行为稳定了官员的情绪，给出了他的诚意，有利于他获得好名声，消弭隔阂。

在皇帝和百官之间，他也充当着润滑剂，调停之间可能的冲突，防患于未然。他得到万历的信任，万历认为他为自己着想，自己的很多的大事也交给申时行来做，比如，册封郑贵妃，修陵墓等。申时行的选择使得他能最后从容而退，并且不至于被文官利用君臣嫌隙颠覆。而对于皇帝这边，万历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却在加深，为后面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评申时行，打油诗：

累心累力善弥缝
调阴合阳行宽明
温柔谨慎终有益
天网羈罗总无情

密林荆棘开无路
身后草莽刺不停
挂冠除带遁风波
百年回梦筑芳名

评张居正，打油诗：

至刚易折严明困
精明强干励行难
独断内外纵时运
融洽君臣今为敌

有心匡扶知劲草
无力补天恨顽石
改革一去成流水
救时名相更显君

3. 囚徒困境 -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皇帝怠政和官场斗争

皇帝不问朝政看似因为消极怠惰，实际上根源于人性的阴阳、道德和私欲之争。文官系统里对这样的消极无为派生出了各种不同的应对方式，相应地，结合于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形成了不同利益和理念的团体。以道德自诩，议论国政，推行改革的东林党就这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万历要废长立幼是出于对于郑贵妃的偏爱，人人都有欲望、个性和私念，皇帝也不例外。郑贵妃被朝臣们目为多事，不安分，没有按照道德和礼仪的要求做好自己的角色。但是爱自己的孩子何尝不是人之天性，这和所谓道德观念是否也并没有太大的冲突？同样地，一个想干事的皇帝，想赢得肯定，受到来自于朝臣们内心由衷的尊敬，而不是仅仅享用碍于皇帝背后神秘权威的慑服所表现出来的敬服，这样的心理难道不应该被表扬？一个夫君想干事，一个妻子努力地从心理和行动上都给予支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连自己的太子的选择权都没有的话，谈何做一个好的皇帝，真正地做出几件像样的事情？

但是强大的舆论压力让万历屈服，长子被立为太子，而三子不得而被“之国”。在国本之争当中，万历在早期也做了积极反应，比如联合支持他的阁臣一起延迟立太子，提出三王并立的想法，等等。种种的挣扎可以看出早期他对于束缚的反抗，即使失败以后，他也尽己所能给予三子福王最优厚的待遇。在后面长达二十年的“万历殆政”时期，他不想见阁臣，然而，他却一天可以见两次福王。出于同情和骨肉之情，亲近亲人，出于心理愤恨，远离朝臣。万历的殆政从感情人性的出发点都可以被理解，而不能仅仅被解释于不负责任，背离正道。

万历消极反抗，然而也很聪明地行事。比如让大臣们找不到攻击他的道德至高点，宣称无为而治，同时在自己可以达到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反应。大臣以道德的大棒攻击他，他不回复，因为回复带来的反攻更多。官员以没有尽职尽责辞职，他也不回复，而且出走空缺留下的位子也不补回。这样，留下来的官员必须适应而软性地和皇帝合作。当然，他们可能还是会攻击，时间一长 也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无感了。例行公事仍然在举行，这样国家机器还是可以运作。官员们的分配靠投签也不是没有好处，这也可以减少群党操作的可能性。

东林党们认为国家不能这样消极无为下去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越拖越大。他们以精神上的道德，个人的君子修作为口号聚拢在一起，占据监察和人事管理的位子，大刀阔斧地与庸怠的官员作斗争。他们秉承道德的宣教，同样地，对手也挥舞道德的大棒以还击。作者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没有法律上的制度来规定裁决事情该如何做，这种争斗往往都出自于感情，或者个人团体的恩怨。皇帝在

的时候还可以作为缓冲，皇帝不在了，情况更恶劣，国本之争持续延烧，互相不信任的团体之间因为小事都可以上升到大的争端，诋毁对方的不作为和不是。

国本之争

万历要立自己宠妃的孩子为太子，一半出于人伦，一半出于抵抗压力的自尊之心。但是，这不符合儒家立嫡立长的道德，如果皇家都不做好表率的话，怎么管理这么大的帝国？矛盾的源头看起来在于太子之位，但这样的情况注定会发生，可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有不同的变化形态，在万历一朝，国本之争就成了矛盾的焦点。这个事件的影响一直延宕到明朝的灭亡，皇帝、朝臣都是输家。

在皇帝这一方，他想拖，首先是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之内有人来纠缠他的话，立太子的问题就要延后。这是个妥协的方法，因为那些内阁大学士们是百官的领袖，他们借口辞职来给皇帝施加压力。一年之后他又很故意地挑起这个争端，说是大臣破坏了这个约定，要延期立储。百官又不依，用软磨硬泡加上道德大棒给皇帝施加压力。

在朝臣这一方，皇帝这样的缓兵之计本来就是没有诚意的表现，而一年以后又以这样无理的理由继续拖延，简直是不可理喻。这么没有诚心的皇帝怎样建立威严，用诚信治理国家？但是，官员中也有倾向于皇帝，或者说是当投机的大和事佬的，比如申时行。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现实平衡的考虑，也或者是出于个人的名位私欲，总之，这样的做法是上不了台面的，一面讨好皇帝，一面在大臣面前作道德的楷模。

这样一来，百官群起而攻击申时行，他顿时威信扫地，失去了百官的信任，除了辞职没有别的办法。申时行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向着百官，皇帝妥协之后，那么他和皇帝的距离就会隔远，没有了皇帝的信任，事情推动不了还好说，如果像张居正一样，引火烧身岂不是大过错。如果向着皇帝，后面三子并不是没有转机转立为储，还有很多变动的机会，这时支持皇帝难道不是给予皇帝最大的信任吗？当然，这样的暗示只能在背地。被泄露出去了，将会被自己的敌人们利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申时行终于也辞职回家了。

政敌的攻击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能够理解帮助皇帝，皇帝对申时行格外地感激。也因为皇帝讨厌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们，所以二辅的反攻也被抓住把柄，被皇帝罢黜回家。而过了两天之后，皇帝才不得不应允百官，让申时行辞职回家。盘算的双方都是输家，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法律、道德和迷信

万历想要立三子为太子也可以有很多迂回的办法，他一直拖延立储也是为了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

如果单单从法律上来看，不立长子有这样的几种站得住脚的论据，比如，立太子都需要册立的程序，长子并不一定就是不二人选；立长不立幼并不是强制性的法规，朱棣就是第四子；立嫡程序上比立长优先，郑贵妃身份高贵，三子就排在前面；郑贵妃可以被立为皇后，废后或者现任的皇后死掉都可能。

但是传统固化了的程朱理学导致了道德在明代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百官百姓都要遵守，皇帝尤其要起表率。上下都要有纲常伦理，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皇帝也不能偏爱幼子。作者认为问题的本质就在于，没有独立于社会传统道德的法律模式，让可以交由制度来解决的问题陷入了舆论和道德的审判当中，皇家的事情变成了全天下的事情。

万历不像开国的几位皇帝一样用权争、武力得到威信，那么朝臣把前几代皇帝的言行作为最高的教导。反而，万历从小就是被朝臣们教育长大的，他必须遵守约束，不能超出该有的范围。万历没有权威，只有接受朝臣们的观点，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踌躇满志，后来就开始了长期的殆政、抵制。

上下否隔，导致天下百姓的信任也出了问题。对郑贵妃谗言也开始让她脸谱化，同情长子之母的群体心态也滋生出各种不知真假的故事。各种街头巷尾的迷信故事让这个变局扑朔迷离。这可能是有目的朝臣们煽风点火，也可能是百姓们的饭后闲谈，舆论的方向不利于万历，时间越拖越久，各方都惶恐不安。太子之争背后潜在的血雨腥风是你死我活的，即使不表态，不站队，也有可能被卷进去。

守成之君的不同命运

官员们对于道德标准不一，有的力行道德，表里如一，有的把当官当做发财的途径，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对于道德和现实的妥协度不一，在外相互顾忌，又因为关系的远近，嫌隙的大小而相互轻视争斗。在人事和关系的网络之下，官员结成大大小小的团体，有的松散有的紧密。

立储之争使得矛盾加大，失败的一方会被清除，胜利的一方则会名利双收。派系斗争变得越来越厉害。有的人谨慎小心，有的人却把立储之争看作是表现自己崇高道德的机会，大鸣大放。

万历作为守成之君，表现得过于懦弱，他知道在朝臣的心目当中，他多行多错，且不服责任。其实他聪明，而且很有性格，即使不理朝政，但是事情还是有序地进行，万历三大征的成功就是证明。而面对朝臣的逼迫，他愿意把时间花在玩乐上，都不愿理那些虚伪道德的说教。

守成之君困境重重，因为他们没有对朝臣对天下的权威。嘉靖刚当上皇帝的时候，以大礼仪来夺回主动权，罢黜占据舆论高地的官员，而重用支持自己的官员。嘉靖后面以无为治理天下可能也是对于改革难以推动而失望，以保守的姿态来采取主动，这样就可以功归己身，过归他人。

正德皇帝更好动，积极，天马行空。他自做主意，丝毫不听大臣的劝告。他征讨蒙古，身先士卒取得了胜利，但是因为与朝臣的矛盾，文官们不承认胜利。史料记载他放荡不羁，纵容奸佞。他有武功但是没有被肯定，重用武官带来的错误后果也被刻意放大。原因就在于他突破道德和官僚体系，被百官一致看坏。如果正德的所为能让百官都接受且称赞，那他的所做所为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嘉靖与正德的比较，都是一意孤行，但是嘉靖早期树威的时候也是从儒家伦理道德入手，以小众但是合情理、合义理的观点掀起旋风，获得主动。而正德的御驾亲征，破坏了道德，也破坏了体系的规范和平衡。嘉靖可以得到一部分文官的支持，而正德得到的是武官和宦官的支持。正德破坏了规矩，任性的举动，得到恶评，给后面的皇帝带来更多的限制。

正德一朝有两个亲王反叛，也是因为正德的作为违背成宪，让皇帝的地位动摇，风言四起，他人有机可乘，如果正德活的时间更长，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万历没有以自己的能力获得朝臣的尊敬，他不能提出不合礼仪的主张。他也没有胸襟包容，“无为”是一种报复性的反应。“无为”带来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仲裁的力量来调和，百官的争斗越演越烈，失去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控制。

4.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从道德出发，在幕后帷幄

申时行从首辅的位置上退下来后80岁寿辰，万历还不忘老师之恩和君臣之义给予他莫大的褒奖。这说明在申时行当家的那些年里，他始终理解万历，万历也体谅了解他。即使有些事情的做法是出自于平衡和协调各方的意见和利益，万历与他也是心心相惜，互相理解。

申时行不肯承认自己的作为是一张白纸，因为在他看来用道德来感召，从诚意出发，最大的作用在于维持制度稳定，防患未然，而不是琐屑地去解决具体的问题。

然而继承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这一点是万历纠结的地方，同时申时行也正视自己的过失。如果公正客观的评价，申时行在首辅的高位上，他的作为并没有太大的过错，他想从幕后、里层来和缓地处理这个问题，然而二辅把这个事情挑起来，矛盾显露无疑，事情却更不好处理了。

申时行并没有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在人事上面做合理、微妙的安排，间接地处理事务，这样一来，他的功绩就不如表面上大开大放的事务来得明显。他选中了潘季驯来治理黄河，而潘季驯对黄河治理有着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和手段，他的治河之道从实际出发，卓有成效。

同时，潘季驯也拥有手腕和声望来协调各地资源和人力，通盘处理和指挥治理黄河。加上他无可挑剔的操守，他在治河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如果没有申时行的识才和保举，潘季驯也不可能重新被信任利用。申时行巧妙地推荐万历起复潘季驯，不让外面的嘈杂之声影响朝廷和皇帝的决策，这都是申时行识人用人的功劳。后来，等到申时行离开后，潘季驯也再度被参劾、罢官。

申时行的处理方式有意地避开矛盾的症结点，以缓和、微妙的手段来达到治理的目的，他的功绩被当时低估了，然而，在万历的心中，显然对于老师和首辅是相当尊敬和抱有好感的；在群臣心中，也不会完全不屑或抹杀他的功劳。从道德出发，以诚意出发，他的目的是希望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人才得到任用，国家得到治理。作为一个王朝末世的掌舵人，不能过多苛求，反而应当抱以敬佩之心。

缓和的利弊和文官政治

李联芳孤军深入败亡引起了明朝与蒙古激进部落的矛盾，这让群臣愤然而怒。万历刚开始也受到群臣的影响而准备采取强硬的态度。然而，申时行的看法却不同，他从实际出发，认为只有激进的那两个部落开始忘乎所以，慢慢显露出征服回藏、挑畔边防的野心，其他同盟与之并不是那么团结。50年以来俺答互市的现状应该继续维持。

最后，万历听取了申时行的意见，没有继续扩大战争，维持和平互市的条约，同时加强防备，针对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做了详细的防御和战略准备。一年后，找到了机会打击了扯力克，这场危机就顺利地解决了。

如果没有申时行缓和处理的眼光和师生之间良好关系的支撑，这场胜利可能难以取得，且蒙古边疆的危机很可能发酵、放大到危害国本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另一方面，建州酋长努尔哈赤的崛起也和申时行当初的疏忽有着一些关联，他的这种和事佬处理问题方式也有可能使得矛盾在萌芽状态时没有正视、遏制，反而被拖大，以至于不可收拾。

申时行最受诟病的就是立储一事，当初如果他果断强硬一点，就不会发生后面欲决不决、横生枝节的事情，也很可能避免皇帝和朝臣们相互对立、消极处事的局面。然而这和申时行的性格不相符，也正是申时行的这种性格和处事方式、和皇帝之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才能说服皇帝，拉近皇帝行事和百官期望之间的距离。

他在事情开端的时候就看到问题，做出委婉的劝谏，不能不说具有远见卓识。他始终忍耐，希望万历改变主意，然而他估计错了，事情向坏的方向一直发展。由立储之争开始，皇帝和大臣的距离越来越远。

文官政治在万历朝决定了大臣和皇帝之间要配合、理解、迁就才能推进国家治理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正因为“上下否隔”，生出了更多的枝节。厂卫是皇帝的耳目，是直接听任于皇帝指挥的，他们和文官的矛盾其实是皇帝和文官矛盾的衍生。其实，万历不算是特别利用厂卫力量来钳制官僚的皇帝，过度指责这一点也不公正。好的是在万历朝文官始终占优势，这比后面天启朝厂卫压倒文官，把持朝纲的情形要好太多。张鲸问题的解决以双方的不快告终，朝臣们还可以换一波新人，休整一番，自我调整一下心情，然而皇帝已经心灰意冷了。

初心

万历并不是刚开始就这样，而申时行也感慨，曾经有一个绝好的机会能够襄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

万历的初心是做一个好皇帝，励精图治，国泰民安。这应该也是张居正等皇帝老师们所期待的。皇帝从小在李太后和张居正等人的严加看管下，被训练成为人们所期待的皇帝，而他也这么认为。然而，事情后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在历史内在发展规律驱使他自身缺点的“引诱”下，他变成了后代人口中的弱主、昏君和殆政皇帝。

祈雨一事中，年轻的万历充分地表达了他的诚意，决心好好地治理国家，远小人，亲贤臣。他的信念使得群臣百姓们有信心，有期待，他的谦逊礼貌让阁臣信服赞赏，他的各项举动都安慰、凝聚人心。最后，甘霖天降，人心大慰，万历在那时是众人眼中未来的明君，中兴之主。

如果那时万历能听取申时行在立储上的建议，或许就没有后面的争执，没有殆政，万历的评价也会很好，治理国家也会卓有成效，帝国的陷落就会推迟。然而，根本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王朝也难逃败亡这一命运。

道德的傀儡

万历有着聪明清醒的头脑但是却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这可能就是万历一朝矛盾难以解决的一个原因。万历想要指派御马监扩大禁军，一方面是一个少年好武尚勇的心性使然，一方面也显露出对于功绩和成就的渴望，然而在廷臣的劝谏声浪之下，他没有能顶住压力，最后让步妥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同样的，万历频繁地谒陵，他厌倦单调的宫廷生活和廷臣的压迫，渴望着被人尊崇，渴望着被人肯定。如果万历是一个当代青年的话，出郊游玩，与众人一起欢乐，享受尊崇的快感，本来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人人都需要消遣娱乐。然而，作为皇帝，他却要在各个方面上表现得合乎礼仪，遵从道德，以国家为重。廷臣们的劝谏他不得不听，不然，不贤明的大帽就会戴在他头上，他希望得到群臣内心肯定和敬佩的初衷就会被打破。

如果万历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皇帝，需要打破这样的困境，那么他面对的，其实不仅仅是群臣的压力，更大的，是道德的压力，他的所做所为要合乎众人的期望，祖宗的成宪，皇帝的角色和责任。这样的压力显然不是个人意志所能抗衡的。

20岁的万历欣然接受阁臣提议修建陵墓，踌躇满志的他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和列祖列宗一样的帝位，能在千秋万世后被后代所崇敬。然而，作为人的万历，却悲剧异常，最爱的郑贵妃的心愿不能满足，自己的个性、愿望始终被压抑，而才能也不能得到施展。按照作者所讲的，这样的帝位是一个机构，在明朝末年的社会背景下，悲剧是注定的。青年万历将会被精神埋葬，成为活着的祖宗，带上皇帝角色的面具，成为道德的傀儡。

5.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道德的模范

海瑞是帝国的道德模范，他总是按照规定的最高一格来要求自己，他死后，余钱都不足以葬身。这样的官员在晚明奢靡颓废的社会当中，为人所敬仰，声名显著。但是，他这样严苛的自我要求，行事为人必然过于偏狭，使得他人对他又敬又怕，敬而远之。

他行事认真，主导法律案件的审理时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模糊地带也通常按照法律的精神来处理。他执法刚正不阿，不避权贵，同时作为一个受封建道德伦理熏陶的士子文人，他也重视道德在法律实行中的指导作用。

然而，按照作者的观点，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而这样的伦理教条乃是制定于千年以前，于今天已经难以面对复杂而且多元的社会环境了。以海瑞之所长，也难以弥补封建社会组织和技术之所短。

海瑞直言抗命，扯掉了一些官员自命廉洁清正的遮羞布，因而直接得罪了胡宗宪和鄢懋卿。反过来，官员们慑于海瑞的名声和威信，往往也只能吞下心中不快，敢怒而不敢言。胡宗宪颜面扫地，而鄢懋卿也不与他接触，绕道而去。这样的脾气秉性必然会让他的官运不遂，然而他的道德和操守却使人难以捉其把柄。他得到命运的眷顾还是后面的事情。

严党倒台，海瑞得以晋升，成为了大众心中的英雄，是真正不畏强权、仗义直言的好官。而他直言于嘉靖，则使得他的命运在一线之间悬停不定。有别于其他官员对于一时一事的争谏，海瑞直接批评皇帝的性格并推翻一切，这使得嘉靖大怒，一纸疏状创下古今谏言之最。

这样的海瑞真的是让人又敬又怕又恨，嘉靖对其的态度也是又恨又赏识，愤怒时嘉靖拿他人撒气，而有时嘉靖也把海瑞比作当代比干。可能出于接受劝谏而心生悔意，也可能是碍于舆论而不得不做妥协，最后海瑞被抓但并没有死，而嘉靖本人也保全了颜面。海瑞听闻嘉靖过世而嚎哭，想来应该也同时包含其对自身经历感伤和感君知遇两层情绪吧。

嘉靖死后，弊政尽改，风气一新，海瑞在帝国的声望无人能比，他极端廉洁和诚实，但是也极端粗线条，这让群臣犯难而不得不把他置之高阁，授以闲职。而海瑞并不屈服，他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救危世于倒悬。然而，他所代表的道德振兴之路按照作者的观点将必定是无效的。

帝国的制度

海瑞履新南直隶巡抚以后，地方官员和豪强们都十分恐惧收敛。海瑞革新所颁布的新政非常的琐碎苛细，一方面规定得太巨细靡遗，实际意义不是很大；一方面这样的严苛规定容易生出问题，成为政敌捉拿的把柄，反而不利于新政的推广。

明朝开国之初，皇帝打击豪强大户解决了土地问题。然而到了隆庆万历时代土地兼并已然很严重，小户被迫向大户借高利贷，而一旦放款到期以后还不上，那么所用来抵押的土地就会为放款者所有。海瑞要改变这样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状态，于是就循五年之内抵押土地仍可以原价赎回的旧例，展开了大规模处理退田的新政。

然而事情却很复杂，海瑞责成前首辅徐阶一家退其一半田产势必会触怒徐阶一派的势力。而明朝田产于长期买卖转让，仔细地析分所用权变得非常地复杂，处理不明的话，必然会引起争讼不断。放贷收地在当时不仅仅是大户致富的手段，一些稍有积蓄的自耕农也会放贷给亲戚邻舍以取得利息。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的风气，如果强令退田，势必会影响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使得改革阻力重重。

民间放贷往往没有一纸契约，海瑞孤身一人，难以理清众多头绪，而这一改革的推行也没有宣布法律性的准则作为依托，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去处理，海瑞不能成功也是在情理当中的事情。其偏激躁进的性格也同样使得这次的改革没有能得到广大臣工的支持，海瑞最后终于被参倒回家，一直赋闲15年方才重新回归官场。

洪武皇帝在开朝之处，大力打击了上至朝廷官员下至乡野富户的既得利益阶层，使得财富田产得以平均，全国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社会。他在乡间标榜道德，由德高望重的耆老们主持乡村自治，然而这一举措使得整个帝国以抽象的道德代替了法律来判断各种是非，埋下了后期治理僵化的祸根。而且帝国的收支往往由地方自给自足，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且不具有灵活性，不能因环境和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如果耕地产出增多，这些利益也会为地方业主和高利贷者所攫取，于国无补，而徒增贫富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财税制度变得凝固呆板。

制度的僵化使得想要做出因时而变的官员们在整体文官系统中显得格格不入。想要刺激商业，改革供应制度而使之具体可行且保持弹性化将会需要另一批技术人员，而他们的管理方式与现在的行政官员必然截然不同，这在当时的帝国官僚系统下是不能完成的改革任务。

而海瑞则希望回归道德纯真，恢复洪武皇帝朱元璋百年前所拟定的旧制，然而这仅仅只有象征性的吸引力，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推行。作者认为，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上的力量来扶持民众，而单纯靠政府的压力和道德的宣传，难以实行。而实际上，这个社会风气从当时开始已经转向消极面了，很多人已经对于社会上民众疾苦充耳不闻，而只是盘算着自己的利益了。

制度困境

在帝国的农村，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和固化是制度性的难题，而加剧这两个阶级分化的助推器是不合理的高利贷现状。按照作者黄仁宇的观点，在我们帝国解决好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之前，高利贷的问题难以解决。

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已经成为形式上的废纸，民间货币主要以碎银为主，因为碎银不需要鼓铸，相比需要鼓铸的铜钱，不论公家还是私人的碎银其质量都有保证。然而碎银也有两个缺点，一是没有铜钱作为辅助货币，二是这种货币并不是由政府统一发放，当局没有调节的能力，加上富裕家庭通常更愿意将金银埋在地下或做成首饰，这样就大大地减少了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而使得通货紧缩，农民借款不易。反向地刺激了高利贷，让其在市场上更加活跃。

明代法律重点在农民的治理，而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商业活动被视为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不受重视。帝国的财政制度主要由低级单位收受，而不依靠商业机构来做技术上的辅助。而官员们的考成只注重田赋能否按时上交，社会秩序是否安定，对于私人商业的发展，基本不在官员的职责考虑范围之内。

海瑞的改革没有重视农村借贷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传统经济关系维护财产的所有权，重视遵守契约，在农田的租佃和抵押上尤其如此。而强行地要求富户退田则是过于武断地要求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行事，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则是必然的。

“一条鞭法”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加在土地上，不分贫富，每亩征银。这样减少了徇私舞弊的空间，同时使得中小地主和贫户的压力不至于过大。

然而作者认为明代的财税制度过于简陋而牵扯面过大，彻底改革需要厘清会计制度，在中上级机构中实行银行管制，这样的话无异于彻底改组文官集团，无法办到。而海瑞的改革往往流于琐碎细节，而其偏激严格的行事作风也使得他的改革阻力重重。

海瑞文集中关于司法的描述显露出明代司法制度对于人权和产权诉讼的无能。司法由县令主管而没有配套的人力和物力，也缺少全国统一的立法和司法，这使得真正公正解决此类诉讼相当困难。而明代的法律立法精神在于保障统治者，行政长官和司法长官归于一人，目的在于用法律为行政服务，管理地方太平。

明代法律制度原始而简单，法律对于人命官司却相当明确，杀人者死的立法原则在当时被沿用。然而，法律却往往不关注此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这类事情一般有地方耆老来仲裁解决，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往往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的纠纷大多缺乏耐心。

海瑞的悲剧

被参倒后，海瑞不得不回原籍闲居，他的家乡是人文和经济同样贫瘠的南海边鄙之地，相比于那些人文荟萃的富饶之乡少了很多悠游的乐趣。不仅如此，海瑞家庭的悲剧也让他苦恼不已，妻子和母亲的矛盾，无后的悲剧，让他抱恨终天。

海瑞的性格来源于其母亲早年的严格管教，他的刚直正义就有着海母的影子。而海母过强的性格却造成了海瑞的家庭悲剧，进而成为政敌所攻击的目标。海瑞可以从伦理纲常中找到依据为其母辩护，然而，却丝毫改变不了个人和其家庭生活的悲剧。

海瑞在母亲的教育下将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二字深深地埋在自己的灵魂当中，时时警惕自己。作者认为这样的单纯思想虽然造成了许多个人生活的悲剧，可是也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

海瑞时刻以做官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来激励自己，以最纯良的道德来磨砺自己，他对自己的要求极端严苛，而他的政治理念却不合时宜，终将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道德号召。

申时行给海瑞的书信从阴面给予海瑞提示：万历皇帝的这次起用仅仅是顺应民情，而海瑞只是直臣的楷模，被用来点缀朝廷。当然海瑞绝不肯忝列虚位，起复之初，就上疏希望恢复洪武皇帝的严刑峻法。而这一提议带来轩然大波，海瑞受到各种批评乃至人身攻击。而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相互攻讦使得朝廷鼎沸，不可收拾。

万历和朝臣终于对此事提出自己的意见：海瑞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不宜让他出任公职，仅仅保留御史的位置。作者认为，政府对海瑞主张的评价其实公开承认了自己本身的矛盾，海瑞要求肃清贪腐的主张被认为是不合公论，而他所援引的恰恰是洪武皇帝当初立法的精神。可见当时的政治措施至此已经和当初的精神相去甚远，不得不和现实妥协了。

被剥脱实际权力、仅仅忝列虚位的海瑞由失望变得绝望，连续提出7次辞呈为不为上面所批准，在万历十五年年底，海瑞的死讯传开，他是百姓心中的大英雄，同时也是官僚眼里惹是生非的异类，在万历十五年，这一个无关紧要、四海承平的年份里，海瑞的一生落下帷幕。

6.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文官和武将

戚继光和万历一朝其他武将的不顺遭遇在作者看来并不是个人性格、仕途顺逆所造成的偶然性事件，而是普遍的，并且带有必然性。在明朝，有才能武将没有发挥其本来的能力，发展不顺的不仅有戚继光，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将。俞大猷屡次被申斥，壮志难酬；卢镗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禁后释放，让其待罪立功，后在塞外捐躯；戚继光的部下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或遭革职或被处以戍边的惩罚。武将命运的症结还是来源于明朝文官与武将之间关系。

文官的施政原则在于平衡，平衡社会和经济中的冲突和矛盾，以政治的手段调剂，调剂无效才诉诸于武力。他们崇尚中正平和、文治兴国，如果最后不得不动用武力，则说明他们教化百姓的努力不够，可以说是一种失败。而武将的气质与文官截然不同，他们关注实际，有时候往往极端，追求的是战场胜利的最大结果，有时也不惜以自己和部下的生命为赌注，孤注一掷。这与文官稳健和平的作风恰恰相反。

明朝重文轻武，社会风气也崇尚文辞、仪表、和举止谈吐，管理事物也遵守儒家原则。文官从精神上对武官就轻视，而实际作战中，一旦上下发生矛盾，即使这些矛盾是由于战场上的客观情况决定的，最后的过错也往往推到武官身上。这种文武关系建立于明朝洪武时期，本意是为了避免唐朝藩镇割据历史的重演，而随着文治的成熟，武官的地位下降到最低点。武将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在社会上的影响还不如文官一篇精彩的文章来得大。武官根本形成不了独立的、可与文官相抗衡的政治集团。

这种风气和制度导致明朝战事不利，军事败坏。北方俺答每年入侵边境，东南沿海在戚继光任职之前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据载，一伙50-70人的倭寇竟然深入腹地，围绕陪都南京一路抢杀，杀伤多达4千人，而南京守军有12万之多，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面对此种情况的戚继光，发挥了其军事才能，耽误之急是整理整顿军队秩序。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对招兵、军饷、职务职责、组织、武器规格等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尤其突出表现在他严格的军法上，集体负责，通行连坐。戚继光的军法严格规定，官兵在作战中如果一人退却影响全局就会被斩首，全队退却队长被斩首，而队长殉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纪效新书》也反应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而戚继光严格治军，一一将细节规定下来，这样这支军队就不得不带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他的军队称为“戚家军”，即使在建立30年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这与文官平衡的政治原则是大相径庭的，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戚继光的戚家军在张党的敌对者眼里被视为朝廷的威胁。

在万历当时，日本国土狭小，而内部纷争不断，按常理应该完全没有力量攻击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明朝的常备军200万，由军户按一户出一人建立，世代不变。而到万历时，军户制度涣散，军户逃亡换籍层出不穷，国家没有大战事，卫所土地被抵押出卖，定员缺编严重，士兵也常常充作劳役仆役，并没有实际上参与军事训练。同时明朝实行的补给制度使得军队的补给来自地方，有时一对多，有时多对一，关系盘根错节，没有中央层面的统筹管理，而管理财政的户部只是中央的监督机关。

组织上的低能带来装备上的落后，士兵的装备也是由各地制造的，谈不上装备精良，标准上也不统一。这样明朝的野战军和农村的民兵相差无几。明朝军官世袭，中期以后开武科取人，但是这种考试重视武艺而不重视军事科学，其中靠武科考试上升成为高级将领的寥寥无几。武官缺少运筹帷幄的谋略而领军掌权，调度攻防的大权也由文官掌握，这样的军事设计使得明朝缺乏全面通盘的军事考虑。明英宗土木堡之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改革，直到倭寇入侵内地，如入无人之地，才使得国家惊醒，改革军事制度，选取有谋略又精通各种战术的军事将领。

倭寇战争

倭寇不同于仅仅抢劫财物的海盗，他们建立根据地，还常常围攻城池。倭寇中的人常常本来是中国人，有时中国人还担任高级头目。倭寇的出现根源于国际贸易图利的需要，明朝禁止海运通商，而禁绝不了获利巨大的走私贸易。在极盛时期，每天有大约1200艘货船在中国沿海活动，而这些货船比中国战船还大。走私贸易遍布日本海到暹罗湾，在中国沿海岛屿，官兵不及的地方，倭寇组织走私港口，在缺乏国

家权威管辖的地方，倭寇的头目成为了解决海上贸易、合同、债权纠纷的仲裁者，逐渐演变成了海上权威。

海盗头目甚至与地方士绅互相勾结，结为婚姻，威胁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但是明朝在政治和军事上虚弱，无法组织有利的反抗，威逼地方富户出钱的情况常发生。而一旦开战，军纪散漫，一人失利，万众奔逃。仓促集合的地方民兵虽然力图保卫地方，但是面对倭寇常常失败。

起初，这些倭寇联合中国海盗的军事行动，目的想要使中国开放海关、对外贸易，而且他们当中的头目也被许以招安封将的承诺。而从胡宗宪诱骗海盗招安，杀死海盗头目事件之后，海盗大失所望，反而变本加厉地侵犯海境，目的便变为单纯的抢劫钱货了。

相比中国军队，倭寇下层的组织力量不可忽视，他们纪律严格，组织严密，常常能以寡敌众。大举入侵时，倭寇常常集结30-50艘船，人数多达上千。在最高点时，可达2万人据守占领区的军事要地。同时他们强迫占领区壮丁加入他们的行列，甚至还强迫组织妇女生产蚕丝，已然自成一国。

倭寇武艺高强，善于小股配合作战。同时他们或佯攻或驱赶难民在前，打心理战。倭寇与官军作战时，先取守势，等到官军锐气降低时，趁机出击。所以，与其说这是中国官军围剿海盗，还不如说是中国的外行对战外国的职业军人。

戚继光统兵

朝廷意识到从军户和卫所征兵不可能有效的组织力量对付倭寇，便批准了戚继光组军的计划。戚继光在浙江招募志愿兵，并加征新税供给新军。戚继光治军着重纪律，严格按照功过赏罚，纪律严峻为当时所罕见。治军成效也非常明显，坚强的部队称为他作战取胜的保证。

戚继光博采众长训练士兵，他将过去不为人所重视的经验整理为一部操典式的书本。在戚继光以前，在军中受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一个武艺高强的士兵是大家心中的英雄好汉。然而实际的战争却取决于整体的协调配合而不是个人武艺的高低。戚继光除了要求士兵娴熟操练技术以外，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在一个步兵单位中长短武器同时配置。

戚继光创造了世所闻名的“鸳鸯阵”。其中，12个士兵为一组，队长1人，伙夫1人，战士10名，相互配合，共同进退。队长在最前，后面两名士兵各持藤牌，再后两名士兵手持狼筅（一种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之后是四名长枪兵分列左右，最后有两名士兵携带镞钯（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鸳鸯阵左右对称，前面藤牌兵主要任务在保持队形，在藤牌后投出标枪，引诱敌军放弃有利的防守，深入我阵。这样狼筅的效力就发挥出来了，狼筅长而枝多，遮蔽敌人视线，可以扫倒敌人于地，后面的长枪兵便趁势刺杀敌人。后面手持镞钯的士兵防卫后翼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形成第二层防线。

鸳鸯阵的运用在于全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突出个人的能力。戚继光着重强调全队配合的重要性，同时也从纪律上严格规定一体赏罚。同时，鸳鸯阵也可以根据地形和敌情的需要改变阵型，击破敌军。

对战术革新的想法，不止戚继光，俞大猷也提出过。他认为倭寇擅长的是陆战，而水战水平低下，我军可以多建战船和火炮歼灭敌军于大海之上。俞大猷提议分拨陆军建设一半的费用来建设水军，但是这些建议始终都没有被采纳，最后俞大猷壮志未酬，含恨以歿。

原因在于，如果俞大猷提出建设水军的建议能够实行，那这必然会牵涉到财政的集中管理。相应地，后勤机构人员必须增加，拖沓行事的作风必须改变，规格和数字必须精准以满足军队建设和管理的需要。然而，这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旧时的帝国，本质上是农业社会，大大小小的农村结合成的集体，没有成文的条例以形成办事的准则，而以礼仪和道德代替法律，对于违反规定法律的行为做掩饰而维持大局的稳定。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之间断然不能相融。

求实精神

与俞大猷相比，戚继光练兵的更加务实。这体现在他在现有的框架下如何对待处理客观条件。他没有去触动整个国家的体制，而是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火器在早期因为各府县制作工艺不一，不能保证质量而没有广泛地用作主要的武器，而后期，他规定在12个人一组的鸳鸯队中配备鸟銃2枝，同时，一局的鸟銃手，也必须要有了一局的步兵协同作战。

俞大猷的主张类似于军队现代化，先提高士兵质量，用以前两人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而戚继光认为建立精锐部队难以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奏效，因为在平叛内乱的过程当中，官军常常会被熟悉当地地理人情的造反军吸住而陷入被动，质量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戚继光征兵只征来自农村的淳朴农民，鸳鸯阵就是按照这些人的情况量身订做的，这样协同作战的效力可以发挥出来。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在使得革新和传统的距离不至过远，不大事声张，保留军队古老朴素的作风，有时他们也和来自卫所军户的军队并肩作战。士兵日常的军饷和在农村打短工的收入相等，同时也另设重赏来鼓舞士气。

戚继光周密细致，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堪称表率。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最后做出决定。戚继光要求士兵在平时一丝不苟的训练，因为由于心理和实际情况，在战场上发挥的武艺可能只有平时的一两成。他也绞尽脑汁尽可能地准确的判断战场的形势，他的部队中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用泥土塑造地形模型，一目了然；他也备有日出日没的时间表，用捻珠作为计算时间的工具，精密地考虑战况，力图在临战前把所有的因素都掌握在手中。

戚继光常常使用战术先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的突出点。而往往这样的突出点是敌人布防的重点，很难攻破。但是他的军队却常常以出其意外的方式快速接近敌阵，迫使敌人仓皇应战，不利转化为有利。同时，戚继光也善于利用伏兵，常常出奇制胜。

在作战中，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攻击敌人重点组织的防御位点。其主要的位点一旦被攻破，全局就会快速瓦解。只要其中日本人一败，胁从的中国人就会不战投降。

福建仙游大战之后，倭寇主力被歼灭，至此，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流窜到广东沿海，不过力量大减，只待于继续荡平了。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天才的将领，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能适应当时的政治，同时在现实的条件下提高军事技术。这在当时是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在一个以文人治国为主的农业国家之内，极端地强调军事效率，改革体制，提倡技术的发展，导致武官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必定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出镇北方

戚继光的功成名就不能少了谭纶的支持和帮助。谭纶是进士出身，但是他精通军事，长期在东海沿海地区担任一方主政官员。谭纶非常支持戚继光的募兵和训练。在谭纶主政福建的时候，戚继光也被他推荐任福建总兵，建立下赫赫军功。1567年，隆庆元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防御京师，不久就提议调戚继光入蓟辽担任最高将领。从此戚继光开始镇守北方，前后历时15年之久。

刚开始由于明朝武官长期处于文官压制之下，戚继光的职位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明朝武官无权统筹全局，武官在自己的防区内要接受文官的指挥，而且还不能经手供给，只能负责自己的军事行动。而戚继光功勋如此之大，又有谭纶和背后张居正的支持，为了给戚继光大展拳脚的机会，在他调入北方之初，谭纶准备授予他“总理蓟州军务”的职位。而这是一个大大的破例，以一个武官的身份而统筹全区的军队指挥调度，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北方边镇需要抵御强大的蒙古骑兵，他们机动性强，军力强大，有时可以组织10万骑兵，大规模地突袭抢掠边境，让人防不胜防。蓟州防区在北京东北一带，编制有士兵8万，战马2万2千匹。防区分主兵客兵，客兵是原来戚继光在南方训练有素的旧部，他们本来可以长期驻扎在这里，但是用于明朝的军事配给制度，供给来源却还是来自南方。同时还有少部分内地卫所调来的短期义务兵，专门在一年中蒙古军队可能进攻的时间段补给过来，而这些士兵不少是雇人替代服役的，并不是原本的士兵，而且雇人缴的钱和实际需要的饷银常常有偏差。这样复杂的士兵和军费来源情况使得全区军队的具体数量很难搞清，质量也让人堪忧。

作者认为这样松散交叉的组织可能并不是无意的，而目的是为了防止武将手握重兵，危及中央，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因此戚继光为改革武备做的一切努力必然会遭到文官系统的重重阻碍。而幸运的是谭纶和戚继光的想法都得到了中枢重臣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前几个月出任内阁大学士，后面成为当时的执政首辅，戚继光和谭纶的想法刚好和张居正重整军备的雄心一拍即合，这样，戚继光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担心上层的政治安排了。

而明朝首辅的权利却十分有限，张居正只能向皇帝提出建议，再送往内阁票拟，这样他才能以内阁首辅的名义做出批示，批准实行。而幸运的是，他是小皇帝万历的老师，他与李太后、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结盟成牢固的中央权力三角，使得他的意图可以顺利推行。而即使像张居正这样权威赫赫的内阁首辅，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制度和成宪的约束下，提出改革，以避免其他官僚的攻击。不过，只要皇帝站在他这一边，那些攻击都不是大问题。

戚继光在蓟州的军事改革虽然有上面力量的大力支持，但是阻力重重。戚继光把原来在浙江的3千士兵调往蓟州，最后扩充为2万人；他的头衔本来上请为“总理蓟州军务”以区别其他镇的总兵，但是后来面对纷议而作罢，但在张居正的高度支持下，蓟州境内的高级将领被调往别镇，与戚继光相抵触的文官也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调走。同时在张居正和皇帝的周旋下，监察官对蓟州的巡查也降为一年一次。

在蓟州的军队里，矛盾也是重重叠叠，北兵和南兵的摩擦，军职出身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冲突等等。好在张居正对这了然于胸，在写给谭纶戚继光的私人信件里面，张居正希望他们务必谦守退让，不要骄傲而自找苦头。

张居正的这种做法有政治家的谋略，但是各镇之间的厉害关系并不能根本解决，反而别人看来，种种的作为表明首辅对戚继光和他之间有人有疏；更险恶的，将此认定为张居正在配置私人政治资本。不过，张居正和戚继光之间的牢固联盟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他们的北方防御战略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辉煌功业

1577年谭纶病死，然而张居正和戚继光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接任谭纶的是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和戚继光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戚继光能大展拳脚。

戚继光来到北方后因地制宜发展出战车步兵协同战术，如同对付海寇的鸳鸯阵一样，这样的战术也是以小股士兵为整体，发挥出巨大的战术优势。具体是20名士兵为一队，10人负责装有两门弗朗机火器的偏箱车，10人则是作战分队，配备有藤牌、镗钯、和长柄单刀，人车相配合，共同进退。同时鸳鸯阵仍然部分采用，不同的是藤牌手的任务是匍匐前进砍掉敌人的马腿，长枪手则主要挑刺敌人使之落马，同时以前竹制的狼筅也升级为铁制。

这样的混成旅有骑兵3千人，步兵4千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的时候骑兵在前，战车得以有足够的时间列队；当敌人逼近时，骑兵就退入战车阵中。敌人骑兵数在1百以下时，混成旅就拒不接战；只有大批的敌骑进入火器射程中约250尺时，所有的火器弓箭才同时施放。混成旅有时也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为“大将军”，重千斤，用骡车运输，点炮时需要用大木楔插入地面固定大炮，而且大炮不用弹丸，而是用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目的是在零距离作战时大量杀伤敌人，而点炮手点完火药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后面冲出，与敌人格斗，战斗时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协同。等到敌人的队形被攻乱，骑兵就从后面出击。然而这样精心研究而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明朝与蒙古和解，所以也没有严格的接受实战的考验，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结果多少是有些遗憾的。实际情况是，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3年，蒙古俺答就放弃了骚扰，约束所有的部落，接受明朝赠与的钱物，在边关与内地互市。

作为主战派的谭纶主张积极备战，准备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一举击败蒙古人的力量，而张居正深知这样的大举动需要全体文武的协同一致，要背负极大的风险，他向戚继光写信到，蓟州无事便是大功劳了。张居正意识到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和南兵的矛盾。

南兵是戚继光从浙江就开始带的队伍，能严格地遵守戚继光的军令，而北兵却素质较差。他打算以南兵训练北兵，而南北兵极不相融的局面让他不得不罢休，同时他想从浙江再调2万南兵的请求也没有被批准。

然而守备蓟州的戚继光仍然做出了极大的功业，他不仅保住北方防线的稳固，使敌军不敢犯境，同时修筑了坚固的长城。鉴于军事情况不是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调北兵修筑长城。在蓟州全境内，堡垒总数达到1千2百座，延绵10年的时间才全部完工。虽然这与原计划相比逊色不少，但是这样宏大的军事工程确实为明朝边境平安立下重大功劳。

戚继光在蓟州前后15年，这等于他前任10人任期的总和。他勤奋、善于学习，亲力亲为，赢得全军将士的尊敬。同时他也在繁忙之余写下了他第二部军事著作《练兵实纪》，后面也出版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戚继光文武兼备，在平常的谈话中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因此，文官对他刮目相看，随着他官阶的步步高升，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一起唱和往来。

戚继光在同时代的武官中无人匹敌。他的现实主义使得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做到了极致。也因此，在明朝的武官制度下，戚继光因为他卓越的功勋，获得了武官能得到的各种荣誉。

难逃寂寞

张居正死后，张党受到清算。在张居正死后7个月，戚继光被朝廷调为广东总兵，虽然官位不变，实际上算是被拔除根基。再一年以后，清算张居正的风潮到达顶峰，戚继光志销意沉，向朝廷请辞，而当时的气氛已经不容他安然退休。戚继光被作为张党参劾革职。

在王世贞所写的《张公居正传》中提到了关于戚继光匪夷所思的记录，传中说张居正过世是因为好色过度。谭纶把房中术传授给张，戚继光则用千金购买姬妾作为礼品送给张。这一段无法考证的野史传闻把戚继光在蓟州重整军备的作为又联系上饮食男女的本能，这让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处理的时候犯难，只好都装作没看见。

戚继光去世之前，他的妻子遗弃了他，他以慷慨助人闻名，而在被革职后，家徒四壁，甚至没有钱治病。这使得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扼腕叹息。后世的传记评论因而竟然把他描绘成一个完人。

而真正的历史学家却应该看清楚，他是一个复杂的人，而不应该把他放在传统道德所构成的标准框架里。戚继光正妻无子，他瞒着悍妻取了3名小妾，生了5个儿子，直到儿子长大成人，都隐瞒着妻子。同时戚继光关心将士的生活，废止了士兵砍柴供他家用的惯例，但同时，北京著名的抄手胡同的煮猪头却可以在百十里以外传马而至。他在蓟州练兵时曾经歃血为盟，起誓贪污腐败的将会遭到天谴，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却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曾经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送礼，而张居正也只是象征性的收受其中一部分，其余的都“完璧归赵”。《明史》本传中就把他和俞大猷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也是委婉地说明一个英勇果敢的军人不一定是廉洁的将领。

除了歃血为盟外，戚继光也在军营里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在训话时也常常提到因果报应。这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一个现实感强烈的将领竟然如此迷信？

在作者看来戚继光的复杂来自于环境的复杂，他如果不精通政治和管理，他就绝不可能做好这么多的事情。军事制度无法全面地改革，就只好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来做部分的修补。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矛盾，先进的部门过于先进，他便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于相差太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在蓟州整兵时与张居正和内阁的良好关系就是一例。在他的军队里，看似矛盾的事物其实是一种调和和妥协。

戚继光的迷信是真的吗？在他同时代的人物里，他们都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倾向，但这常常是一种治军的手段。士兵的文化水平低下，如果主将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军事教育训练就难以进行。

而面对另外的对象，戚继光可以立即改变语气。比如他的书房叫止止堂，文集称为《愚愚稿》，他歉抑自守，就是向所有文人表明作为武人的他比不上别人。

戚继光这种人事上的才能助力他军事才能的发挥。他精通于政治而最后却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作者认为戚继光最后的寂寞结局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措施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这样他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凄凉而落寞。将星陨落之时正是1588年1月17日的清晨，按照中国的历法，仍然属于旧年，万历十五年。同一时间，西班牙的舰队已经整装出征英国。而30年后，明朝的军队与努尔哈赤的军队交锋，因为缺乏戚继光苦心研究的战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最后兵败。八旗这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最终取代了明朝。

7.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身世

在后世人的眼中，李贽是明朝后期启蒙思想家。而在明清所处时代的封建时代的晚期，专制体制达到顶峰，启蒙思想为当时主流思想所不容。李贽作为殉道者，于1602年，万历十五年后的又十五年，以刀自刎于狱中。作者评价他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者，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里不时地体现着这样的理想主义特性。他的书在其同时代和以后时代里不断地被翻版再印，而他的思想，在作者看来，却并没有在当时乃至后代走出一条新路出来的可能。

与其他的一些评论家不同，作者认为李贽也没有能跳出他的阶级属性，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他本人，在担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以后，也经常受到周围地主士绅们的接济，而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一制度的缺点和对社会经济体制上改革的想法。李贽过去走的也是儒家的道路，在1587年以前他已经完成了儒家伦理规定的一个人所需要对家庭付出的责任。在次年，李贽便削发为僧，抛却了呆板拘束的生活，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

李贽在被捕入狱审讯时相当地悲观，虽然他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但他的辩护不是争锋相对的抨击，他也没有像西方宗教改革领袖们面对迫害所展现的那种坚持和自信。同时，他对于自己也并不那么孤芳自赏，而像批评别人一样同样地给与严格的自我剖析，这样内心矛盾的奇怪现象就是李贽本人的画像，而作者认为其根源就在于传统的政治已经凝滞，新的思想无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萌芽发展。

李贽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他的祖先是泉州的巨商。在六世祖以后的几代里，他的祖先们与外来的欧洲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们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而到了李贽这一代，这些异域特色已经完全消退，他从小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到李贽这一代时他的家境已经中落。1552年得中举人之后，因为经济困难，没有能力再考进士，便按照惯例在政府中任职；然而因为于此，他多年沉浮于下级官僚，郁郁不得志。1559年，李贽父亲病故，按例去职丁忧，期满后入京求职，等待了一年零八个月后，才得到一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以教书糊口。他生有4个儿子，3个女儿，但是除了大女儿以外，其他都不幸夭亡。据李贽本人的记录，经济最困难的一次，他有7天的时间没吃到什么东西，等到有东西吃的时候，囫圇吞枣一口而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粮食。

1563年，李贽祖父去世，按照当时的习惯，他收到了相当丰厚的随礼。但是他依然拮据，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把一半的钱在他做教官的河南买了一处地作为妻女的衣食之资，另外一半的钱则用来回福建安葬他的祖父以及祖先三代一共五口的灵柩。按照风俗，安葬先人要讲究风水，而当时他在现实环境的压迫下不得不迁就，只求入土为安而不再有过高的奢望。他的妻子被留在河南，这也是没有多余的钱的缘故，等到三年后重新聚首，妻子才告诉他，两个女儿因为饥饿而死，他痛苦不已，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李贽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3年，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任司务5年，又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近5年，最后在1577年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在任知府之前，他的官俸极为有限，仅够糊口，只有在知府任上，才有了各项其他收入，逐渐有了积蓄。

自我矛盾的哲学思想

李贽在知府任上的其他收入似合法似非法，他并不像海瑞一样对这些灰色收入一概不要。他和常人看得一样，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而不同的是，他能诚实坦白这一目的，而不是打着高尚的大旗子。他的这番言行就引出了一个自我矛盾的问题：人人都心口不一，但是应不应该挑出个人的私心，坦率地承认而不以假仁假义的态度来掩饰呢？

李贽的矛盾之一就是对待妻子的态度。他的妻子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只要对丈夫有利，她就能忍受乃至牺牲一切。李贽53岁官运顺遂时却决定退休，后来李贽寄居在湖广黄安耿氏兄弟家。后来李贽与耿定向闹翻后，搬到佛堂里面去，李贽妻子无一不顺从。但是李贽妻子却始终不能理解丈夫的精神世界，直到她临死之前，她都在不断地呼唤丈夫希望能回到故乡泉州。李贽对于妻子是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愧疚的，然而苦于妻子基于儒家礼教的人生观不能理解丈夫四海为家的宏志。在精神世界里面，他们从未也最终不能走到一起。

李贽对世界的抗争也有来自这个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所固习下来的宗族传统。他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又在外做过知府，是宗族里面有名望的人。在封建社会里面，一个人取得这样的成功绝不是单凭个人一世的努力所能成就的。它需要一个农民经过几代的积累，从佃农、自耕农，再到田地的积累，提供子孙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其母亲和妻子也要为儿子、丈夫读书做官而自我牺牲。这样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是背后全体家庭为基础的奉献和牺牲。因此荣誉的获得者也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这样的集体观念还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个家庭上的，而且是整个宗族；在道德上，读书取得功名成为帝国的官员后就必须负担起为宗族的声誉和福利负责的重担。而这恰恰与李贽坦诚不愿墨守成规的思想相矛盾。当家族中闲杂人等以俗事来强逼他时，他毅然落发明志。当知道家族不顾他的愿望，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时，他同样寄以辛辣的反抗，让他的侄子不要来假哭作好看，也让身边的人不要报自己的死信给家乡。

落发芝佛院

李贽落发的佛院坐落在麻城城外的一座山上，叫做“芝佛院”。芝佛院没有向政府登记，没有正式的执照，因此也不需要向政府纳税。作为佛院长老的李贽也负担起向外化缘的责任。因为他作为思想家的崇高地位，他的未来宾客里不乏高官巨卿，通过朋友的周济，他竟然没有再出现像从前一样困窘的时刻了。

这些与李贽在金钱上有所往来的官员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这些官员们都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也经受过以优雅脱俗为宗旨的美好教养，然而一旦接触实际，他们往往发现这样的精神仅仅是海市蜃楼，有时他们身上的自私苟且连一般人都不如。李贽与他的同好们的交流研究可以彼此触发灵感，缓解这种思想上的内心交战，而获得内心的自洽和平和。有了这样的交流，李贽的生活得以解决，同时他们的这些活动也刊印成文集，得以在社会上传播他们的思想。

他和耿定向的争执和矛盾是他在这一时思想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他在个人自由追求上的信念得到巩固，一路到生命的结尾。

与耿定向之争

耿定向是李贽辞官后到湖广黄安时的东家，他有兄弟四人，二兄是耿定理，与李贽交好。耿定理在思想上并不与李贽一致，但是他性格怀柔天资聪颖而言谈轻松，能够在冲突中避开争论而转用禅宗式的机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多次调解李贽和其长兄耿定向的冲突。

耿定理一生未仕，而耿定向是朝廷大员。耿定向的哲学思想认为伦理和物理的理应该有所区别，实际的施政也应该和哲学思想有所区别。这为当时一元论的主流思想所不能接受。他与李贽有哲学观点上的矛盾，也有着个人情感上的冲突。李贽斥责耿定向不诚实、言行不一，而耿定向则认为李贽为了立异而立异，所谓放浪形骸其实是沽名钓誉。

李贽用各种的手法来治学，他评论历史，评论小说，看似涉猎广泛，但是始终犹如用各种乐器演奏同一支交响曲。他的着眼点在于分析公和私的冲突，口头上的道德和实际生活当中取舍的矛盾。对于以道德标榜的读书人言行不一的情况，这种公私冲突、道德冲突尤为明显。

最终，李贽还是不得不靠他批评过的人的接济来生活。即使他有比同时代的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始终也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他的著作并不是绝意官场、退隐山林后的文娱自乐，反而事事谈论着官僚政治，这为他后面的悲剧结尾埋下了伏笔。

儒家哲学

儒家学说的始祖-孔子-没有直接的提到性善或者性恶。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君子生活的终极目标。温和有礼，自我克制，遵循礼仪是仁的初级阶段，更高的要求是要把思想和行动都纳入仁的规范，经过不断的积累达到去私无我的境界。仁是儒家的崇高追求，是超越人世间的最高品质。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即使身为圣贤，也要不断地去私，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性恶是先天的。而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发扬保持仁的本能，这种本能恰恰说明性善出于天赋。

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孔子和孟子学说的差异反应了他们历史社会背景的差异。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小国林立而礼义不彰，他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里世袭的卿大夫，施行德育教化，恢复先代的和平美好。孟子处于动荡的战国，大国之间往往全民动员年年征伐，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再允许哲学家们以悠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孟子的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统一全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治理的基础。孟子雄辩滔滔，希望说服君主和大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之中，避免大肆杀戮。

朱熹和王阳明

到了唐宋以后，中国重心南移，社会生活变得复杂。官僚阶层由原来的高门大族变为绅士阶层。文官政治和中央集权确立为国家的统治基础。儒家单纯的伦理哲学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必须要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朱熹是宋代集大成的大儒，他的《四书集注》是明清两代士人的教科书，是科举的标准答案。他的治学方法被称为“理智化”，“客观”，和“归纳法”。他的学说基础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物包括实际具体的事物也包括抽象的伦理。一个事物不是孤立的，相互连接，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动作就反映了物的特性。

朱熹认为传统的组织和习惯就是“天理”，需要克制“人欲”而来顺从。通过格物-接受、观察、研究事物-可以得到发现“天理”。然而在作者看来朱熹的治学方法太过于“支离”，他的归纳旨在通过自然界的理来支持孔孟伦理的理。而他的结论却在观察之前已经决定，那就是必须符合孔孟的伦理。

与朱熹理学相对的是王阳明的心学。他提倡追求心理的自在自然。而心学的短处在于过于主观。如果一个人只以个人心理的参禅来寻求顿悟，所获得的超然的乐趣只在自己的一身，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却不负有责任。而儒家经典一贯是士大夫行动的标准和议论的根据。这与个人以直觉为主宰的倡导不相融。

作为封建王朝的知识份子，他们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也是经济上中等地位以上的地主阶级，是社会真正的主人。正统的儒家观念是维系他们的纽带。对于李贽的行为不检点，法官审判的时候并不着墨很多；他主要的罪状是“感世诬民”，要害在于他的言论会引发社会思想的不稳定，进而影响统治的根基。

心学流传

心学由王阳明创立，在明代中后期发扬开来。心学没有接受理学类比的方法。他们认为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天理是先天存在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

心学中的这种自然而然产生的是非善恶观念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是“意念”-了解、知晓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的途径-的主宰。心学重视因果，并且由此推导出“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人可以自然的“致良知”，但是要能化为行动，就很困难了。

心学并不是随意从自我内心出发，自以为所以就可以成为真理的主宰，而是符合和接受儒家的教条，以求得经世致用。如果单纯的鼓励人们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容易对人心产生动摇，对社会的公序良俗产生撼动，这就是心学对于当时社会潜在的“危险性”。

王阳明没有直接明确地说明良知和意念的关系，他含糊地说，良知无善无恶，意念有善有恶。王阳明的弟子王畿认为良知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而意念是枝节性的牵缠，一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摒绝意念。

按照王畿的学说，一切的真实性只存在于心中，一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的说，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恶。李贽以此时常做出于习俗常理难容的事情，他认为他的这种自由度，是进入了无善无恶的优秀分子的特权。在他的著作中这种优越感时常流露。

李贽也受到王艮学说的影响，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阳明的信徒。他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这是从王阳明“知圣人之道，行圣人之志”推广而来。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日常需要，以日常知识作为基础，是李贽思想的又一个侧面。

李贽的历史观

李贽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传统的看法。他认为历史上的治乱和“文”“质”相关联。君主如果专注于“文”-社会物质文明-而使之发展到极致，就是为后世乱象埋下了导火索；而相反，一代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也就是使百姓免去饥寒，注重实际而不推崇社会文化的虚浮和华丽。而作者认为，社会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改进，就会发生动乱。当时明代的文官集团却已经丧失了发展新的技术，创造新的法则的可能，也就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了。

李贽重视大臣的执政功绩，认为官员应该弃小节而顾大局，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用过于在意手段的正当与否。他推崇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贡献的执政者。他不喜欢海瑞，弃之为“万年青草”，而推崇实干的俞大猷和戚继光，称赞张居正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李贽重视实际的政绩，而不高谈阔论虚无的道德和礼仪。但他自己本人却并不是一个实践家，而仅仅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但是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他去过山东曲阜，拜谒过孔子，尊崇真正的儒家道德。

作者认为道德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践，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变通。而帝国开国二百年来，始终以“四书”的道德作为法律的根据，而不是以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中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给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治理跟随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也得以发挥。帝国的社会越来越凝滞，士子们读书从政的风气也因袭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李贽在哲学层面，张居正在政治层面，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而同样为时代所遏止。李贽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历史观，而他又原谅了很多历史人物，比如冯道和卓文君，这些人的所为与当时的道德规范不合，但是也情有可原。只要长远看来为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以远见卓识指导自己的行动，都足以称为“上人”。

李贽的历史著作《藏书》在作者看来缺乏系统性的观点。而李贽对这本书自视甚高，称其为“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讲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他的观点不能容于当时的时代，所以济期望于后代。但他也没有给与社会改造的看法。在作者看来，李贽认为千百年后皇帝仍然出席经筵，依然靠科举取士，是一个荒诞的笑话。

末路

芝佛院于1601年初春被一场人为的大火烧毁。虽然案件始终没有被侦破，但是很大程度上可以知晓是当地士绅和官吏所指派的无赖干的。李贽在麻城的支持者是梅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梅家的主掌者梅国桢当时在西北作战，家中有女儿梅澹然和其他诸多女眷。李贽和她们往来通信，探讨学问，过从甚密。尽管李贽不断声称他们之间交往完全合于礼法。但是反对者更深挖出李贽十余年前狎妓和出入寡妇卧室的情节，这些伤风败俗的行为为众人所攻击。

本来李贽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本人的辩解，他到底是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旁不管。关键在于他毫无忌憚的态度，还把这些“乱事邪闻”刊刻成书流传开来，这样等同于向社会公开挑战。他的名气越大，挑战性就越强烈。对于当地士绅来讲，对他进行责罚，烧毁佛院，属于正确的“卫道”。

在马经纶的邀约下，李贽北上通州。在生命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他相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李贽1601年提出这一观点，刚好言中在东北开始发迹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把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归并为一体，改造为半军事化的军事组织。才仅仅两年之前，满族有了文字，他们文化低下，但同时“质”上保持着纯真、朴素和实干。

给事中张问达上奏参劾李贽猖狂放肆、引诱士人妻女的行为，并且阐明李贽这种行为对官僚士绅和社会风气的破坏性。现在李贽已经到了通州，距离京城只有四十里，如果进入京城的话，惹出更多问题，将会比在麻城更为严重。

张文达的奏疏罗织李贽的罪状，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他把可能的后果也作为现实的罪行，这在当时是司法的习惯。

李贽被押入监狱，其著作也被查封。不过李贽在监狱里面没有受到折磨，仍然能够读书写字。审讯完毕以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判处重刑，只需要押解回籍，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但是皇帝却久久不作批示。

最后，李贽在一次侍者为其剃头的时候，夺过剃刀自刎而死。李贽的《焚书》《藏书》一版再版，我们对他的研究可以看见当时思想界的苦闷深度，对于当时思想和政治的活动有另一个可以观察的角度。

作者总结道，当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儒家简单粗浅的原则所限制，而无法在法律给与上有创造性架构，在社会治理上面给与技术性的支持，以解决实际问题，其社会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实干家、思想家、皇帝、文臣、武将们难以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

全书的故事在这里结尾。万历十五年，丁亥年，这一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评李贽，打油诗：

空谈莲花竟为何

实为狂禅出儒格

为人处世须有律

阴阳实在需调和

实干为民总有益

放浪独行空自性

困顿难觅出身路

百年回首真梦呓

2022年3月29日

周之超

于麦迪逊，威斯康星

All rights reserved